

东周时期青铜小口鼎研究

尚如春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 河南郑州 450001)

内容提要:东周时期青铜小口鼎最早兴起于春秋早中期的今安徽江淮和鲁南沂沭地区,以Aa型和Ba型为特色,属于群舒文化系统,与鲁南-江淮平盖鼎的流行存在一定关联。春秋晚期开始,与楚式盖鼎相结合形成Ab和Bb型小口鼎,由此纳入楚文化系统直至战国晚期。结合自铭、出土情境和形制分析,青铜小口鼎主要用作水器,但亦有部分作为食器。此类青铜鼎使用人群局限于大夫级以上中高级贵族,没有明确的性别和族属指向。小口鼎在墓葬中的出现提升了水器或鼎类食器在青铜礼器组合中的地位。东周时期青铜小口鼎及其发展历程是当时楚地与鲁南-江淮青铜文化之间密切往来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东周时期 青铜小口鼎 时空流变 功用 使用人群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标识码:A

小口鼎是东周时期一种较为特殊的青铜鼎类,基本特征为小直口、圆肩鼓腹、底附三蹄足,以往学界多将其视为典型楚器。实际上,在安徽繁昌汤家山^[1]、浙江绍兴坡塘M306^[2]、山东沂水纪王崮M1^[3]等楚地以外的地区亦出土此类铜鼎,部分与所谓的楚式小口鼎差别明显^[4]。对于此类小口鼎的性质,一般将其归入水器,与作为食器表示身份等级的正鼎明显不同。虽然早有学者质疑此说,认为小口鼎中既有作水器亦有作食器者^[5],但始终未能引起充分讨论。至于其渊源、传播、使用者等问题更是鲜有涉及。因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全面搜集相关资料,尤其是新近发表的考古材料,对青铜小口鼎的形制进行细致分析,并就其时空流变、功用、使用人群及相关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一、形制与流变

经统计,目前已公布的青铜小口鼎共30件。以平盖居多,根据耳部的不同,可分两型。

A型 20件。双立耳。根据整体形态分两亚型。

Aa型 3件。扁鼓腹,足略瘦高。如安徽繁昌汤家山墓:3(图一:1)^[6],盖顶微隆,口径20、通高36.4厘米,年代为春秋早期偏晚^[7]。山东沂水纪王

崮M1:871(图一:2)^[8],口径15.9、通高31.9厘米,年代为春秋中期偏晚^[9]。

Ab型 17件。圆鼓腹,多长方形立耳。根据体型变化可分五式。

I式,5件。深腹圜底,矮粗蹄足接于近腹底处,直立耳。如河南浙川下寺M1:70^[10](图一:3),口径19.5、通高33厘米,年代为春秋晚期偏早。

II式,3件。腹略深,蹄足、立耳稍外撇。如安徽寿县蔡侯墓所出(图一:4)^[11],环状立耳,口径24.5、通高47.5厘米。墓主卒于公元前491年^[12],属于春秋晚期偏晚。

III式,2件。蹄足位置接近腹中部,耳外撇明显。如河南浙川徐家岭M11:11(图一:5)^[13],口径20.2、通高58厘米,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早^[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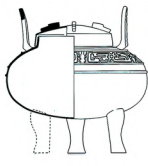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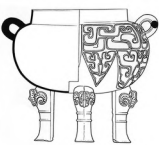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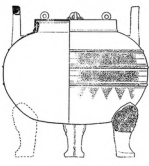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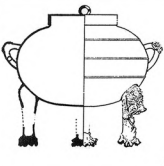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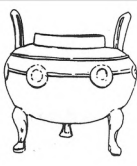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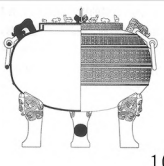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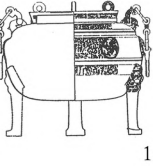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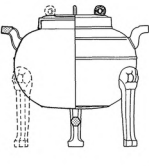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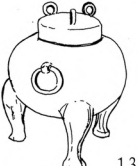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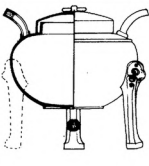
IV式,5件。腹底平,高直蹄足起棱并接于腹中部,耳外折。如湖北襄阳陈坡M10S:69(图一:6)^[15],口径21.8、通高45.2厘米,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

V式,2件。腹较浅,小平底,高直蹄足位置上移至腹中部偏上,耳外撇较甚。如湖北黄冈曹家岗M5:5(图一:7)^[16],盖顶微隆,口径12、通高26.6厘米,年代为战国晚期。

变化趋势:腹逐渐变浅,耳从直立到外撇,蹄

收稿日期 2023-09-15

作者简介 尚如春(1991—),女,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战国秦汉考古、楚文化考古。

分期		A型		B型		
		Aa	Ab	Ba	Bb	Bc
第一阶段	春秋早期	 1				
	春秋中期	 2		 8		
第二阶段	春秋晚期		 3	 9		
		 4	 10			
第三阶段	战国早期				 11	
	战国中期		 5		 12	
		 6				 13
第四阶段	战国晚期	 7				

图一// 青铜小口鼎形制与分期图

1、2.Aa型(繁昌汤家山墓);3、沂水纪王崮M1:871) 3.Ab型I式(浙川下寺M1:70) 4.Ab型II式(寿县蔡侯墓) 5.Ab型III式(浙川徐家岭M11:11)
6.Ab型IV式(襄阳陈坡M10S:69) 7.Ab型V式(黄冈曹家岗M5:5) 8、9.Ba型I式(青阳庙前汪村、六安九里沟) 10.Ba型II式(邳州九女墩M3:39)
11.Bb型I式(随州曾侯乙墓C:185) 12.Bb型II式(随州擂鼓墩M2:70) 13.Bc型(丰台贾家花园墓)

足由矮粗变高直,足位置从近腹底逐渐上移至腹中部之上。

B型 10件。环耳,多设链环。根据耳细部差异分三亚型。

Ba型 4件。半环耳。根据足部变化分两式。

I式,3件。高直蹄足接于腹底。如安徽青阳庙前汪村所出^[17](图一:8),口径18.4、高25.5厘米,年代为春秋中期^[18]。安徽六安九里沟征集(图一:9)^[19],口径13、残高21厘米,年代属春秋晚期偏早^[20]。

II式,1件。矮蹄足稍外撇。江苏邳州九女墩M3:39(图一:10)^[21],双环耳衔链环,口径22.2、通高39.2厘米,年代为春秋晚期偏晚^[22]。

变化趋势:蹄足由高变矮,由直立变外撇。

Bb型 5件。以一对兽形环耳套接提链。根据体型变化分两式。

I式,2件。器型略矮。如湖北随州曾侯乙墓C:185(图一:11)^[23],口径25.7、通高38.5厘米。墓葬年代上限为公元前433年,属于战国早期。

II式,3件。器型略高。如湖北随州擂鼓墩M2:70(图一:12)^[24],口径22.5、通高55厘米,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早。

变化趋势:腹渐浅,器型由矮变高。

Bc型 1件。小环耳衔环。出自北京丰台贾家花园墓(图一:13)^[25],盖顶隆起,高长蹄足内收,口径8.8、通高23.5厘米,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26]。

结合各类型小口鼎形制演变及分布特点,可将小口鼎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表一)。

第一阶段:春秋早中期。这一时期小口鼎仅见Aa型和Ba型I式,除1件出自鲁东南莒文化区外,其余皆出自安徽江淮群舒之地。

第二阶段:春秋晚期。Aa型消失,新出现Ab型和Ba型II式小口鼎。前者主要分布在豫西南楚地,另外在安徽寿县及江苏邳州、浙江绍兴等地亦有零星发现。后者数量极少,仅见于江苏邳州。

第三阶段:战国早中期。Ba型已不见,Ab型继续流行,新出现Bb型和Bc型小口鼎。除唯一的Bc型小口鼎出自冀北燕地外,这一时期其余两型小口鼎集中发现于豫南鄂北及江汉平原等楚系墓葬中。

第四阶段:战国晚期。仅存Ab型小口鼎,散见于鄂东、皖北等这一时期楚文化核心分布区。

目前发现年代较早的Aa型小口鼎皆出自安徽江淮与鲁南沂沭地区,其中以安徽江淮出现时间最早。结合该型小口鼎形制来看,年代最早的

繁昌汤家山墓和稍晚的沂水纪王崮M1所出小口鼎鼎盖皆饰曲尺形钮。此种以曲尺形钮装饰鼎鼎的做法主要见于同时期流行的铜平盖鼎,后者在东周时期最早兴起于鲁南地区^[40],并很快影响至邻近的安徽江淮地区,区域特色显著。Aa型小口鼎与该区域平盖鼎浅腹、高足、平盖的特点基本近同(图二:1—4),可见小口鼎在安徽江淮地区的最早出现并非偶然,而很可能受到这一区域内曲尺钮平盖鼎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春秋中期出现的Ba型小口鼎分布区域亦集中在江淮地区,其整体形态与Aa型小口鼎较为接近,区别在于前者为双半环耳,后者为双立耳,推测应是在Aa型小口鼎基础上加以改造分化而来,二者同属群舒文化系统。然而无论是Aa型还是Ba型小口鼎,使用时间均较短暂,春秋晚期以后即消失不见。

学界普遍认可的楚式小口鼎属于Ab型,迟至春秋晚期出现于南阳盆地楚墓中。该型鼎与前述源自江淮地区的Aa型小口鼎虽同为立耳、小口、罐形,但其深腹圜底、蹄足矮粗的特点却明显有别于后者。以往有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应存在明显的缺环^[41]。实际上,除小直口、立耳外,其整体形态与同时期楚地流行的箍口鼎、折沿束颈鼎颇为相似(图二:5—7),深腹矮足为这一时期典型楚式盖鼎的基本风格。由此可见,Ab型小口鼎并非直接源于Aa型小口鼎,而是在继承楚式鼎特征并融合安徽江淮地区Aa型小口鼎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形制。除豫西南楚地外,该型鼎在寿县、邳州乃至绍兴亦有见到。寿县蔡侯墓所属蔡国是楚附庸国为学界共识。邳州九女墩M3为徐墓,绍兴坡塘M306国别族属虽存在争议^[42],但由其出土小口鼎铭文可知作器者为徐人。春秋晚期徐楚关系密切,无论是从徐国墓葬或有铭青铜器^[43]均可得到印证。此三件Ab型小口鼎尽管发现于楚文化区外围,但很可能与楚有关。进入战国以后,伴随着楚国经略重心的转移,Ab型小口鼎的分布从南阳盆地逐渐向南扩展至鄂北、江汉平原及鄂东、皖北等地,且其延续时间较长,一直持续至楚灭。在Ab型小口鼎不断发展的同时,大约在战国早期还新出现Bb型小口鼎。此型小口鼎集中发现于湖北境内,既有楚墓亦有作为楚附庸国的曾国墓葬。从形制上看,应是在Ab型、Ba型小口鼎基础上对耳部加以改造分化而成。至于Bc型小口鼎,目前仅见于冀北燕地,推测此件南方特色的小口鼎在燕地的出现极有可能与楚有关。

综上,小口鼎最早兴起于春秋早中期安徽江

表一// 青铜小口鼎信息一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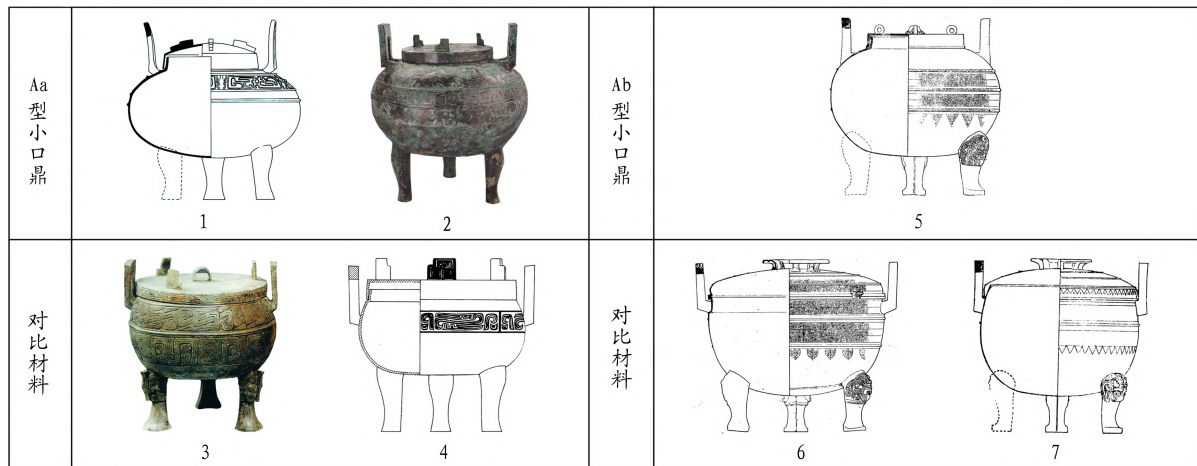
阶段	型式	出土单位	自铭	出土情境	墓主身份	墓主性别
一	Aa型	安徽繁昌汤家山墓		扰乱	高级贵族	
		安徽舒城河口M1 ^[27]		在甗形盃和带流缶之间	中级贵族	
		山东沂水纪王崮M1		不明	莒国国君	男
	Ba型I式	安徽青阳庙前汪村采				
		安徽铜陵市区采 ^[28]				
二	Ab型I式	河南浙川下寺M1		紧挨盘、匜、盃	孟懿姬;大夫级	女
		河南浙川下寺M2	濂鼎	与盃缶、盘、匜、鉴置于一处	荔子冯;楚令尹	男
		河南浙川下寺M3	浴鬯	盘匜、盃、小口鼎、盃缶排一列	鄢中姬丹;大夫级	女
		河南南阳八一路M38 ^[29]	汤鼎	紧挨盃缶,其上放置勺	申公之孙彭子射;下大夫级	男
		河南南阳物资城M1 ^[30]	汤鼎	未公布	申公之孙彭无所;下大夫级	男
	Ab型II式	安徽寿县蔡侯墓		不明	蔡昭侯	男
		浙江绍兴坡塘M306	汤鼎	不明	王室贵族	
	Ab型II式、 Ba型II式	江苏邳州九女墩M3		前室一角,挨着子母口鼎; 挨着兽首鼎,附近有盘、豆	徐国王室贵族	
Ba型I式	安徽六安九里沟征集	鬯				
三	Ab型III式	河南浙川徐家岭M11	鬯鼎	鼎、鬯、小口鼎、盃缶排一列	遯夫人;大夫级	女
		湖北随州擂鼓墩M33 ^[31]		不明	低级贵族	
	Ab型IV式	湖北襄阳陈坡M10		与匜鼎、盃缶、盘、匜置于南室	上大夫级	
		湖北荆门包山M2 ^[32]	遗册“一 汤鼎”	与盃缶、盃、盘等置于西室	邵佗;楚左尹	男
		湖北江陵天星观M1 ^[33]		与盘、匜、盃缶、盃置于北室	潘胜;楚封君	男
		湖北江陵望山M1 ^[34]		紧挨子母口鼎,旁有陶盆、鉴	悼固;下大夫级	男
		湖北枣阳九连墩M1 ^[35]		与盘、匜、盃缶,圆壶置于西室	上大夫级	男
	Bb型I式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		紧挨升鼎	曾侯	男
		湖北郧县乔家院M39 ^[36]		西邻盘匜,东邻箍口鼎	低级贵族	
	Bb型II式	湖北随州擂鼓墩M2		紧挨子母口鼎	诸侯级	
		湖北江陵天星观M2 ^[37]		与盘、匜、盃、盃缶等置于东室	封君夫人;上大夫级	女
		湖北黄梅刘岳M1 ^[38]		与盘、匜、盃缶、盃置于一处	下大夫级	
	Bc型	北京丰台贾家花园墓		子母口鼎、钊、小口鼎排一列	低级贵族	
四	Ab型V式	湖北黄冈曹家岗M5		紧挨盘、匜、盃	下大夫级	女
		安徽寿县李三孤堆墓 ^[39]		不明	楚幽王	男

淮与鲁南沂沭地区,其出现可能受到了鲁南-江淮区域平盖鼎的影响,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兴盛于长江以北楚地,战国晚期以后衰落。Aa型与Ba型小口鼎属于江淮群舒文化系统,Ab型和Bb型小口鼎属于楚文化系统,后者通过对前者的融合

与改造形成自身特色,并随着楚国的对外扩张及楚文化的辐射而影响至更广的区域。

二、功用分析

对于小口鼎的功用,大多数学者认为其属于水器,依据主要有三:(1)自铭汤鼎或浴鼎,汤即



图二// 青铜小口鼎形制比较图

1.安徽繁昌汤家山墓:3 2.山东沂水纪王崮M1:871 3.山东枣庄东江墓地 4.安徽舒城河口M1
5.河南浙川下寺M1:70 6.河南浙川下寺M36:2 7.湖北当阳赵家塆M4:1

热水;(2)常与盥缶、盘、匜等水器共出;(3)鼎口小不便取食而更适宜盛装热水。但也有部分学者对“汤”字的解释提出质疑,认为汤鼎亦可作为烹煮的食器^[44]。下文拟从鼎铭、出土情境及形制三方面对其具体功用进行探讨。

1. 鼎铭

由表一可知,小口鼎有铭文或文字记载可确知其名称者共8件^[45]。半数为汤鼎,另有一“濂鼎”、一“浴鬯”、一“让鼎”及一“鬯”。“濂”与“汤”古音近同,故濂鼎即汤鼎;“浴鬯”之“浴”为沐浴、盥洗之意。这两点已为学界共识。唯后两者的释读仍有争议,部分学者将其与“沐”相联系^[46],以表明其水器功用,但亦有学者持不同意见^[47]。对于小口鼎自铭所反映的具体用途,关键在于汤鼎之“汤”的含义。《说文》:“汤,热水也。”多数学者据此判断汤鼎即煮开水的鼎,与作为食器的鼎无关^[48]。但亦有部分学者认为“汤”字还有其他解释,而并非单纯指热水:如张亚初认为古时食用的汤浆也称汤,汤鼎也有可能盛汤浆之用^[49];刘彬徽引《广雅·释诂二》“汤,爨也”、王念孙疏证“沉肉于汤谓之爨”以及《礼记·礼器》“三献爨、一献孰”、郑玄注“沉肉于汤也”等,认为汤鼎还可作烹煮肉食即肉汤之用^[50];王人聪看法与之类似,并进一步梳理了《士丧礼记》《通俗文》等文献中“爨”“淪”之解释,认为汤字有用沸水烫熟食物之意,汤鼎为烹煮食物的炊器^[51]。

上述诸家对于汤字的释义表明,小口鼎自铭为汤鼎者,除煮热水、开水之用外,亦可能作为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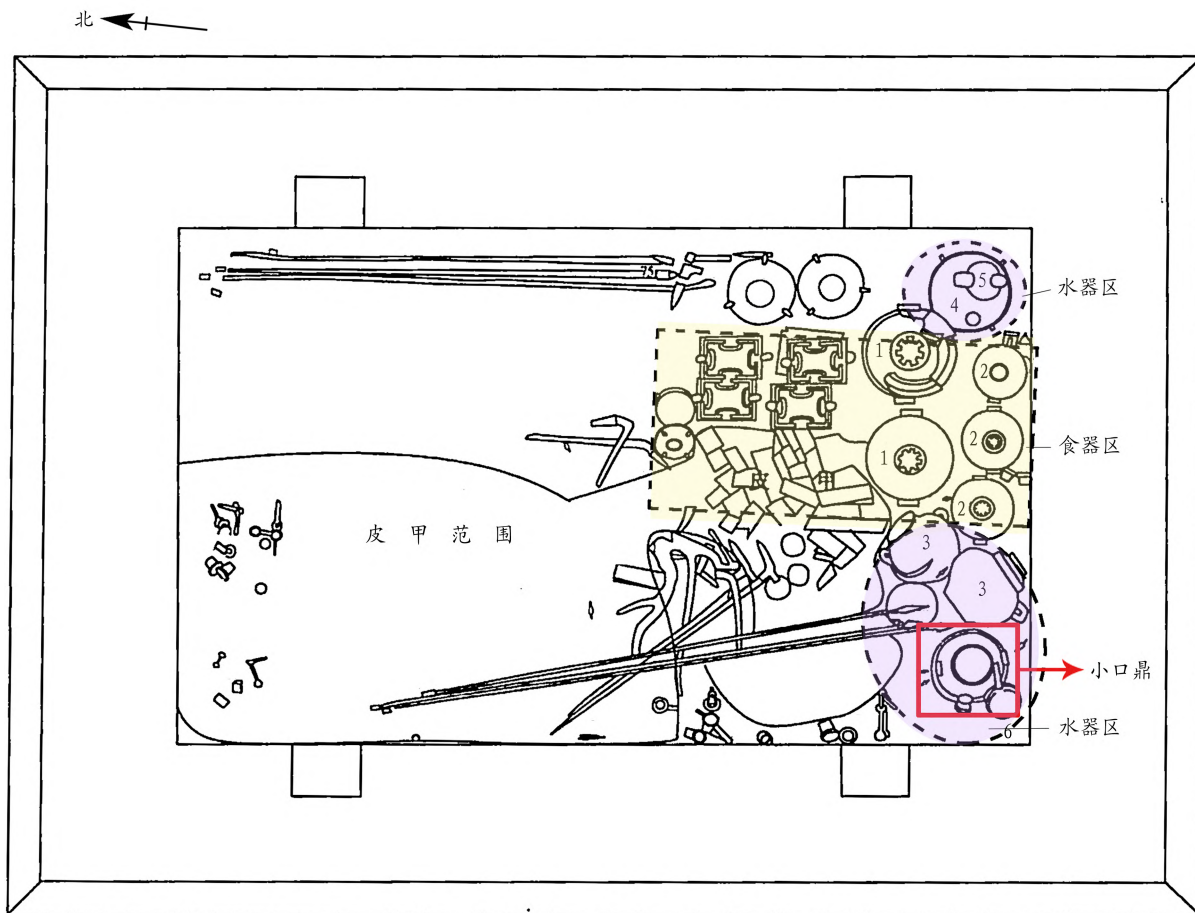
汤浆、肉汤或烹煮食物之用,即小口鼎既可作水器又可作为食器。

2. 出土情境

目前发现的青铜小口鼎数量虽然较少,但仍有部分出土信息较为明确者可供参考。根据其出土情境及与其他器物的相对位置,可分为以下两种。

(1)与盥缶、盘匜之类水器紧邻或置于一处。如南阳八一路M38,小口鼎置于椁室西南角,东端与两件盥缶紧邻,盥缶以东为作为食器的5件盖鼎,最东端则为盘匜。另外在小口鼎上还见有一勺,其形制属于与水器类搭配使用的挹水器(图三)^[52]。襄阳陈坡M10随葬品极为丰富,分置于三个椁室内,其中小口鼎、匜鼎、盘、匜、盃、鉴等与车马兵器置于南室,而升鼎、子母口鼎、鬲、甗、簋、壶、尊缶等其他类礼容器均置于东室。此种将小口鼎及盘、匜、盥缶等水器与其他作为食器的鼎分置于不同椁室的做法还见于枣阳九连墩M1、荆门包山M2、江陵天星观M1和M2等。

(2)更靠近其他鼎类食器。如随州曾侯乙墓,铜礼器大多集中在中室南部。鼎形制多样,除匜鼎外,其他类鼎大体分三列呈东西向顺次摆放:南端第一列从东到西为6件升鼎和1件小口鼎,第二列为方座簋、鬲与剩余3件升鼎,第三列为子母口鼎和大镬鼎。盥缶、盘、匜之类水器集中置于第二、三列的最东端(图四)。随州擂鼓墩M2情况与之类似,相较盥缶、盘匜等水器而言,小口鼎位置距离作为食器的子母口鼎更近。江陵望山M1



图三// 南阳八一路M38椁室青铜器分布位置图

1. 束颈折沿鼎 2. 箍口鼎 3. 盥缶 4. 盘 5. 匜 6. 勺

铜、陶礼器绝大多数放置于头箱第二层,其中铜礼器多集中在头箱西南部,东南部主要放置陶鼎、甗等食器和酒器陶尊缶。小口鼎位于南端中部略偏东,与铜子母口鼎、壶相邻,旁边还有一日用陶盆和陶鉴(其内放置竹筴)。作为水器的铜盘、匜、盥缶则集中置于头箱西南角(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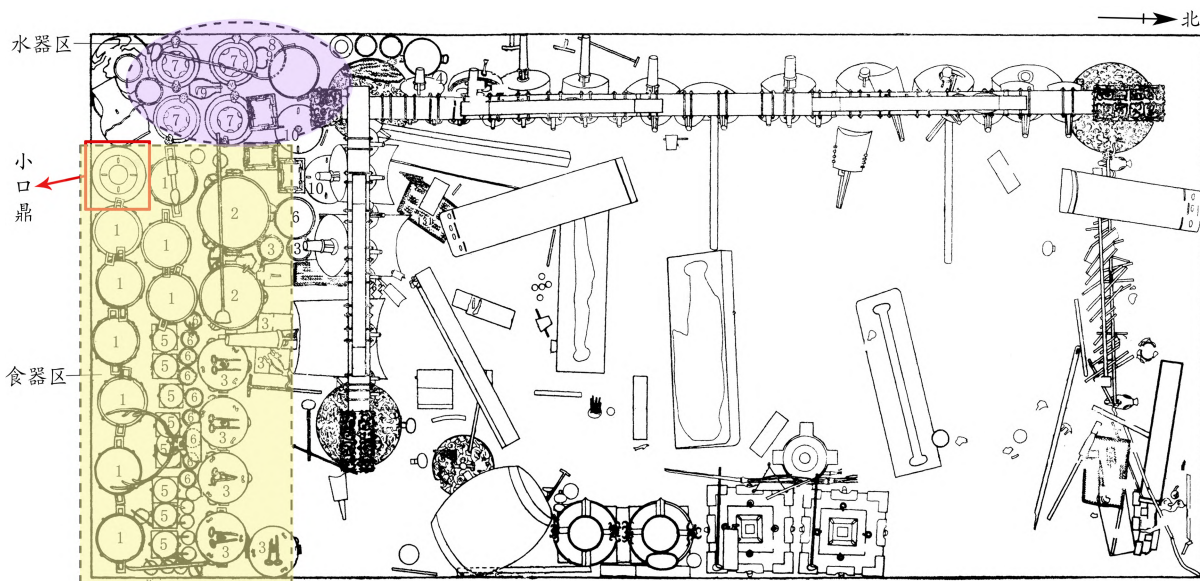
结合表一来看,小口鼎出土位置绝大多数属于第一种即与盥缶、盘、匜等水器紧邻或置于一处,此时小口鼎应作为水器。少数如曾侯乙墓、擂鼓墩M2、望山M1等属于第二种即与食器距离更近,此时的小口鼎更可能承担了食器的功能或兼具水器、食器两种功能。值得注意的是,邳州九女墩M3出土两件青铜小口鼎,却并未置于一处,其中一件与作为食器的子母口鼎距离较近,另一件与兽首鼎相邻、附近有盘、豆等,其不同的摆放位置或许正代表了功用上的差异。

3. 形制

小口鼎形制特殊,小直口、罐形腹,底附三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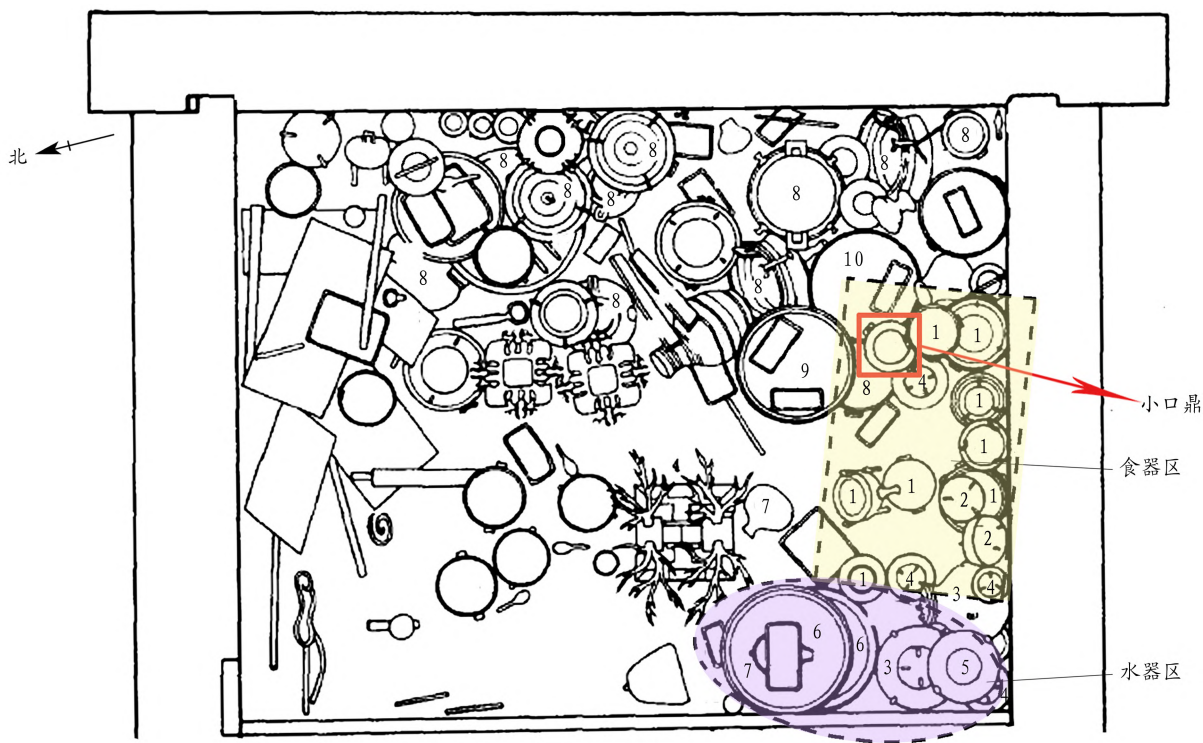
足,与彭裕商所划分之H型圆腹罐形盃^[53]极为相似,唯后者有管状流和提梁(早期无)。一个更为明确的例证在于铜陵车站所出土的一件铜盃^[54],该盃除腹部多伸出一管状流和扉棱外,其形制与Ba型小口鼎完全一致,以致在早年曾一度被错定为鼎。与之形制类似的铜盃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早中期之际的河南潢川磨盘山所出者^[55],肩部双环耳,无提梁。小口鼎或者说至少Ba型小口鼎很可能是在此类铜盃基础上发展而来,二者或属张懋镛所提出的“派生关系”^[56]。铜盃目前多被认为属于水器,作为其派生而来的Ba型小口鼎功用应大体近同。

除与作为水器的圆腹罐形盃形制较为接近外,李零^[57]、范毓周^[58]均曾先后指出小口鼎与分体甗下部相似,后者进一步提出小口鼎当由分体圆甗的下体鼎演化而来,且同样作为煮水之用。《博古图录》记载:“甗之为器,上若甗而足以炊物,下若鬲而足以饪物,盖兼二器而有之。”^[59]甗



图四// 随州曾侯乙墓中室青铜器分布位置图

1. 束腰平底升鼎 2. 折沿鼎 3. 子母口鼎 4. 匝鼎 5. 方座簋 6. 鬲 7. 盨缶 8. 盘 9. 匝 10. 鉴



图五// 江陵望山M1头箱第二层器物分布位置图

1. 子母口铜鼎 2. 铜敦 3. 铜尊缶 4. 铜壶 5. 铜盨缶 6. 铜盘 7. 铜匝 8. 陶鼎 9. 陶鉴 10. 陶盆

为蒸煮器并无疑问。上部为带孔甑用以蒸食；下部形制多样，有鬲形、鼎形、釜形等，其双耳既有立耳亦有环耳衔环，确与小口鼎相似。然而无论是鬲、鼎或釜皆属烹煮食器，即使作为分体甑的

下部，也并非仅仅是烧水以蒸食一种作用，其本身亦可用于直接烹煮羹食。以小口鼎形制接近分体甑下部而断定其为煮水之水器有失偏颇，不排除其作为食器之可能。

总之,小口鼎的功用并非如以往学界认为的那么单纯,其自铭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功用,对于小口鼎功用的确定仍需结合出土情境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在多数情况下小口鼎作为南方地区特色水器,承担温水、煮水功能,但同时亦有部分作为烹煮的食器。目前出土的青铜小口鼎内虽均未见动物骨骼,但不排除有其他残留痕迹,期待未来残留物分析等科技手段的介入以佐证其功用判断。

三、使用人群及相关问题

青铜小口鼎集中发现于长江以北楚地与江淮群舒地区,属于这一区域较为特色的礼器器类,但其出土数量却极为有限,且每墓仅一件(九女墩 M3 除外)。那么其在使用上是否存在某种限制?在礼器组合中地位如何?本文拟就此作进一步考察。

在使用人群等级方面,春秋早中期出土青铜小口鼎的三座墓葬中,沂水纪王崮 M1 墓主为莒国国君^[60]。繁昌汤家山墓共出 2 方鼎、3 立耳鼎及甬钟等,其墓主虽不一定为吴国国君^[61],但一般而言方鼎的使用等级应相对略高。舒城河口 M1 随葬 2 鼎、1 簋、1 盥缶、2 盃,其偶数对鼎看似略少,却符合这一区域墓葬用鼎传统,墓口面积近 40 平方米,与同时期河南浙川下寺 M8 接近^[62],推测墓主至少应为中级贵族。春秋晚期以后,青铜小口鼎集中出自楚墓及受楚影响的蔡、曾、徐墓等。凡楚系墓随葬青铜小口鼎者,其墓葬等级普遍较高,包括楚王(寿县李三孤堆墓)、附庸国国君(寿县蔡侯墓、擂鼓墩曾侯墓)、令尹(浙川下寺 M2)、封君(江陵天星观 M1)、上大夫级(浙川下寺 M1、江陵天星观 M2、荆门包山 M2、襄阳陈坡 M10、枣阳九连墩 M1 等)、下大夫级(南阳八一路 M38、南阳物资城 M1、江陵望山 M1、黄梅刘岳 M1)等。即使是受楚影响的邳州九女墩 M3 和绍兴坡塘 M306,从其共出 3 列鼎、完备的 3 套编钟及“徐王”字样的若干铜器来看,其墓主等级亦不低于中级贵族。

在使用人群性别与族属方面,随葬青铜小口鼎的 26 座墓葬中有 16 座墓墓主性别可辨,其中 5 座为女性墓,分别是春秋晚期的浙川下寺 M1、M3 和战国中晚期的浙川徐家岭 M11、江陵天星观 M2、黄冈曹家岗 M5,余 11 座皆为男性墓。男性墓随葬小口鼎比例略高于女性。使用青铜小口鼎的墓葬墓主族属相对繁杂,涵盖了莒、舒、徐、楚、蔡、曾等。即使在使用青铜小口鼎的楚人中,亦既

有芈姓公族如蕞氏、昭氏、悼氏,也有仕楚的外来宗族如彭氏、潘氏等。可见,此类小口鼎的性别、族属并不明显。

尽管青铜小口鼎的使用人群等级限制较为严格,但出土数量毕竟有限,且其并非高级贵族墓葬所必需器类。无论是用作盥洗的水器或烹煮的食器,其在墓葬中均不是唯一水器或食器。作为水器的青铜小口鼎往往与盥缶、盘、匜、盃等置于一处,其中与盥缶位置尤为紧邻,二者关系应更为密切。在绝大多数墓葬中,凡出青铜小口鼎必共出盥缶,反之出有盥缶的墓葬却未必共出小口鼎,且盥缶数量在不同等级墓葬中甚至存在一定等差^[63]。相较于小口鼎相对严格的使用人群限制,同为南方特色水器的盥缶具有更高的普及性。从出土青铜小口鼎数量最多的楚系墓来看,其墓中水器类别颇为丰富,以盘、匜、盥缶为主,间或搭配小口鼎、盃、鉴等。后三者数量较少,并非每墓必备,显然不属于核心器类,其共同之处在于多集中出自中高级贵族墓葬内,属于中高级贵族在常规水器组合之外有意增加的特殊水器。至于作为食器的青铜小口鼎,与束腰平底升鼎、子母口鼎等其他鼎类位置较近而较髙、甗等烹煮器和盛食器略远,说明其与鼎关系更为密切。这些墓葬中出土鼎类食器繁多,小口鼎作为其中一种,虽然仅一件且不属于食器中的核心器类,但无疑提高了鼎类在整个水器组合中的重要地位。

四、结语

作为东周时期南方地区特色青铜鼎类,小口鼎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早中期安徽江淮与鲁南沂沭地区,以 Aa 型和 Ba 型为特色,属于群舒文化系统,其出现与这一区域内曲尺钮平盖鼎的流行存在密切关联。春秋晚期开始,小口鼎分布重心转移至楚地,与楚式盖鼎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楚文化风格的 Ab 型和 Bb 型小口鼎,并随着楚文化的扩张影响至更广的区域。

青铜小口鼎的使用人群等级普遍较高,基本局限于大夫级以上中高级贵族,没有明确的性别、族属指向。使用者等级的高低是影响青铜小口鼎随葬与否的重要因素。小口鼎的功用并不单一,主要作为水器,在部分情况下亦可作为食器。无论在水器或食器组合中,小口鼎均未占据核心位置,属于组合中的“边缘性礼器”,其在墓葬中的出现既具有标识墓主身份等级的作用,亦提升了水器或鼎类食器在青铜礼器组合中的地位。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补充,东周时期青铜小口

鼎的发展历程进一步印证了春秋中晚期楚地与鲁南-江淮地区青铜文化存在着密切交往关系。除小口鼎外,楚墓所见盃、盃缶乃至偶鼎制度等均深受江淮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64]。这一现象表明,尽管江淮诸小国在春秋时期陆续被楚国所兼并,但其部分器类和器型却被楚选择性地吸收和借鉴,在构建楚系青铜文化体系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1]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繁昌县文化馆:《安徽繁昌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2期。
- [2]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 [3]任相宏:《沂水纪王崮施工出土的青铜汤鼎和取暖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青铜器与山东古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 [4]何晓琳:《试论青铜小口鼎》,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八集),大象出版社2009年。
- [5]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31—132页。
- [6]同[1]。
- [7]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10页。
- [8]李伯谦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5》,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8年,第237页。
- [9]冯峰:《论沂水纪王崮M1的年代和墓主》,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1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 [1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浙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58页。
- [11]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7页。
- [12]陈梦家:《寿县蔡侯墓铜器》,《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 [13]王长丰、乔保同:《河南南阳徐家岭M11新出阝夫人媼鼎》,《中原文物》2009年第3期。
- [14]袁艳玲、张闻捷:《楚系青铜器的分期与年代》,《考古学报》2015年第4期。
- [1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襄阳陈坡》,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85页。
- [16]黄冈市博物馆等:《湖北黄冈两座中型楚墓》,《考古学报》2000年第2期。
- [17]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81页。
- [18]李国梁:《皖南出土的青铜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考古学会编《文物研究》(第四期),黄山书

社1988年。

- [19]胡仁宜:《六安市九里沟出土的铜簋》,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考古学会编《文物研究》(第二期),文物研究编辑部1986年。
- [20]范毓周:《关于子汤鼎的几个问题》,《南方文物》1997年第4期。
- [21]林夏、林留根:《关于邳州九女墩三号墓出土的“汤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青铜器与山东古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 [22]同[7],第1833页。
- [23]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37页。
- [24]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擂鼓墩二号墓》,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 [25]张先得:《北京丰台区出土战国铜器》,《文物》1978年第3期。
- [26]同[7],第1993页。
- [27]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舒城县文物管理所:《安徽舒城县河口春秋墓》,《文物》1990年第6期。
- [28]同[17],第178页。
- [29]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春秋楚彭射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3期。
- [30]董全生、李长周:《南阳市物资城一号墓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4年第2期。
- [31]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擂鼓墩战国东汉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2年第2期。
- [32]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02页。
- [33]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 [3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44页。
- [3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枣阳九连墩M1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9年第3期。
- [3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湖北郧县乔家院墓地M39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4年第1期。
- [37]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53页。
- [3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梅县博物馆:《湖北黄梅刘岳墓地M1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21年第4期。
- [39]吴长青:《寿县李三孤堆楚国大墓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以安徽省博物馆藏该墓青铜器为中心》,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 [40]李宏:《论春秋时期平盖铜鼎的起源和承传》,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青铜器与山东古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 [41]同[5],第133页。

- [42]李零:《绍兴坡塘306号墓的再认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6期。
- [43]孔令远:《徐国青铜器群综合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4期。
- [44]a.同[5];b.王人聪:《徐器铭文杂释》,《南方文物》1996年第1期。
- [45]除表一所列小口鼎铭外,在信阳长台关M1、望山M2所出竹简遗册上亦有“一汤鼎”的记录,此两墓虽未出铜小口鼎,但见有陶小口鼎。
- [46][日]广濑薰雄:《释卜鼎——〈释卜缶〉补说》,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古文字研究》(第29辑),中华书局2012年。
- [47]a.禚健聪:《曾公子弃疾铜器铭文辨读二则》,《中原文物》2016年第4期;b.程鹏万:《子汤鼎铭研究综述》,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河南大学甲骨学与汉字文明研究所编《古文字研究》(第33辑),中华书局2020年。
- [48]a.李零:《楚国铜器类说》,《江汉考古》1987年第4期;b.陈昭容:《从古文字材料谈古代的盥洗用具及其相关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1本第4分,2000年。
- [49]张亚初:《殷周青铜鼎器名、用途研究》,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古文字研究》(第18辑),中华书局1992年。
- [50]同[5]。
- [51]同[44]b。
- [52]井中伟、王建峰:《商周青铜挹注器再辨识》,《考古》2022年第2期。
- [53]彭裕商等:《商周青铜盃研究》,《考古学报》2018年第4期。
- [54]安徽省文物事业管理局编:《安徽馆藏珍宝》,中华书局2008年,第95页。
- [55]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潢川县发现黄国和蔡国铜器》,《文物》1980年第1期。
- [56]张懋镛:《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
- [57]同[48]a。
- [58]同[20]。
- [59]宋·王黼编撰、牧东整理:《重修宣和博古图》,广陵书社2010年,第369页。
- [60]同[9]。
- [61]张小帆:《繁昌汤家山西周墓的再认识》,《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
- [62]同[10],第4页。
- [63]张闻捷:《楚国青铜礼器制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4—145页。
- [64]张闻捷:《江淮诸国青铜礼制初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1期。

A Study of Bronze Narrow-Mouthed Tripods during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SHANG Ru-chun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Heritag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Abstract: Bronze narrow-mouthed tripods first emerged in the early to mid-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n the Jianghuai and southern Shandong regions, characterized by types Aa and Ba. These vessels are linked to the Qunshu cultural system and the prevalence of flat-lidded tripods in these areas. By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ypes Ab and Bb, influenced by Chu-style lidded tripod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Chu cultural system, continuing through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alysis of inscriptions, burial contexts, and forms suggests that these tripods were mainly used as water vessels, though some also served as cooking implements. Their use was primarily limited to mid-to-high-ranking nobles, with no clear gender or ethnic distinctions. The appearance of narrow-mouthed tripods in tombs enhanced the status of water vessels or tripod cooking implements in bronze ritual sets. The development of bronze narrow-mouthed tripods reflects the clos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Chu state and the Jianghuai-southern Shandong bronze traditions during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Key words: Eastern Zhou period; bronze narrow-mouthed tripod;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function; user groups

(责任编辑:黄苑;校对:张平凤)